

## 第一章 治国新思维

改革需要科学的新思维。邓小平的治国之道，体现了新的政治思维，是其治国新思维的产物。理论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方法决定于目标、理想的内容与性质。邓小平的治国新思维，是由其特定的治国目标、治国参照系决定的。邓小平的治国构想，他关于西方道路、东欧方式、东亚模式、中国道路的实践经验及其理论成果的深刻反思，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政治国理论、方法及其新思维的思想起点。

### 一、治国构想

目的决定方法、手段。一位政治家的治国理论与方法，决定于他的治国目标。有什么样的治国目标构想，就有什么样的治国理论与方法，并形成其相应的治国思维方式。

在执政治国的实践中，不同的政治家，抱有不同的治国目标。治国目标 古代皇帝即位登基时，有时往往会“昭告天下”现代西方人则称之为“施政纲领”，由当选者在隆重而庄严的就职典礼上，向选民宣布，请选民监督实行。有的还要手按《圣经》带

有宣誓的意味 反映了“受命于民”的政治哲学观念。

中国至今未正式使用“施政纲领”的提法，但实际上类似的东西是有的。诸如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等等，都可以说是施政纲领的传世之作。

执政者的治国目标构想，是在治国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建设与改革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治国目标构想。主要包括：纵向的治国大思路，横向的治世理想治国目标、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及其全部治国构想的思想主题，等等。

### 1. 治国大思路

邓小平的治国构想，包括纵、横两个方面。纵向的治国大思路指的是区别轻重缓急 审时度势 因势利导 循序渐进地解决中国建设与改革问题的思想逻辑与实践程序。事物的发展是一个永无穷尽的链条。邓小平执政于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如何一步步地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引上他所设计的发展道路，有一个纵向的思路和宏观的操作程序问题。

邓小平曾经概括过他纵向的治国大思路，指出：“路线是非澄清了 规划制订了 措施提出来了。现在 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 就是要落在实处。<sup>①</sup>又说：“现在 纲领有了 蓝图有了 关键是要真正重视 扎扎实实地抓 组织好施工。”<sup>②</sup>回顾邓小平执政治国的全部活动，显示给人们的正是这样一种纵向的思路与实践逻辑。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第96--9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0页。

为解决路线是非问题，邓小平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主要抓了三件大事，一是批判“两个凡是”支持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是确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一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又正确评价毛泽东。

在领导人不断更替的政治舞台上，作为后来者都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前任领导人的问题。前任的情况不同，对待的方式各异。前任领导人的影响力愈是巨大，后来者愈要审慎对待。没有一个不正确对待前任领导人的后来者，能使自己站住脚的。有的即使一时站住了，历史也会在若干年以后另外出现一种“回归”现象，把后来者对待前任领导人的某些偏差和失误纠正过来，还他一个历史的“公正”。

在人类思想史上，愈是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论，思想家的探索愈是曲折，愈是包含着日后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愈需要后人正确地对待。毛泽东，尤其作为晚年毛泽东，是一个具有深刻复杂性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首先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晚年错误、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理论路线是非。毛泽东晚年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错误，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的。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党内在反右斗争问题上并无大的分歧发生。比较严重的党内分歧，始于对“大跃进”的评价。对“大跃进”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毛泽东晚年思想中“左”的错误的认识问题。从此以后，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曲折发展，莫不与此有关。

1976年，巨人毛泽东的去世，既为人民所沉痛哀悼，客观上又为结束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推进发展毛泽东思想带来了新的转机。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是痛苦与期望并存，悼亡的哀乐

与现代化的新长征号角交相奏鸣。但是，历史机遇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开创新局面的现实。就像“拨乱反正”这个充满辩证色彩的汉语词汇所表示的那样，毛泽东以后的中国，正如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去世后的情况一样，首先就面临着—个如何对待毛泽东，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问题。

邓小平 1960 年就提出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sup>①</sup>支持罗荣桓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sup>②</sup>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主张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人之一。1975 年主持整顿工作时，邓小平重申：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毛泽东思想。<sup>③</sup> 1977 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久，他就提出：“两个凡是”不行。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sup>④</sup> 为此，邓小平及时地支持、推动思想理论界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进而将这一讨论推到全党全国，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教育，正式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正式确立了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百端待举，诸事待兴。

邓小平领导全党在指导思想进行了根本性的拨乱反正以

① 《邓小平文选》（1938—1965 年）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268—270 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3—34 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36 页。

后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具体的全面评价并不急于作最后的结论，而是根据当时全党全国尚未成熟的思想认识条件，采取了缓一缓、放一放的方针，一方面避免分散全党全国人民进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时间，从一些具体工作入手，创造条件，为全面评价作准备。同时也可以让人们能有较多的时间更冷静地想一想，看一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后来总结出的不争论的方法，实际在此时已露端倪。不争论，引导人们向前看，是邓小平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领导艺术与治国方法。他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应该科学地历史地去看，“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sup>①</sup> 邓小平的方法首先是抓思想政治方向的根本转变，就全国范围来说，首先是从大的方面把党的指导思想转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四个现代化为党的工作重点的政治路线上来。“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sup>②</sup> 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反复讲一个方法原则，就是讲对理论、路线是非的拨乱反正。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对毛泽东的评价等等，都要坚持从大处着眼，从大处着手，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39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06页。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sup>①</sup>从大处着眼，目的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把大家的思想和眼界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sup>②</sup>后来在写作、讨论、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再次重申了从大处着眼，引导人民向前看的方针。“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sup>③</sup>而且强调：“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sup>④</sup>毛泽东的一生，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写毛泽东的错误，也宜粗不宜细，“要概括一点”。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sup>⑤</sup>“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sup>⑥</sup>

邓小平之所以能对评价毛泽东坚持“大处着眼”的正确方针，原因在于他对这一问题本身即具有“大处着眼”的眼界和思想境界，是从党和人民的长远利益，从国家的历史和长治久安出发的。他坚决支持叶剑英、陈云、李先念、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正确评价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前进的正确主张，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1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1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56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1页。

⑤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1页。

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0页。

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sup>①</sup>毛泽东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是我们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儿子。否定毛泽东 给毛泽东抹黑 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给中华民族抹黑。这既不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方法，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sup>②</sup>毛泽东一生功大于过，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支柱，是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否定毛泽东，就会在中国人民中造成深刻分歧与巨大混乱，就等于于是自取败亡之道。历史是辩证的。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sup>③</sup>邓小平坚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中的正确的东西，改正其错误的东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树立了一个正确对待自己领袖人物的榜样，表现了他如毛泽东所说的为人厚道的品格和在执政治国方面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在澄清路线是非方面，还有一个从思想政治路线到组织路线的具体思路，一环套一环 有条不紊地前进。他指出 就全国范围来说 就大的方面来说 关于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3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43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06页。

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sup>①</sup>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基本总结，正式确认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在此基础上正式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

理论和舆论宣传工作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能否有效运用思想意识形态工作为政治目标服务，是衡量一个政治家是否成熟的标志。所谓武功文治中的“文治”即有文化建设、社会教化的意义。意识形态战线的思想理论斗争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的关键时刻，高度敏感地认识到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失时机地加以支持、引导和倡导，充分表明他在执政治国方面具有与毛泽东一样的娴熟技巧与政治眼界。

邓小平在引导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后，进一步抓的是组织路线问题。在他看来：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算已经确立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sup>②</sup>这就提出了一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这一问题后文将专门论及。

邓小平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后，认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开始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到他更加欣赏的开拓创新上来，把设计改革开放、运筹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行动纲领、规划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9月，在邓小平主持下，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十二大的基本任务就是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6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6页。

把党的政治路线具体化，“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sup>①</sup>

除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 20 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 800 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这个“小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能不能落实？邓小平带着这个问题，在十二大召开不久就进一步抓落实，搞调查研究。他到南方视察，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方面强调抓落实，强调“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sup>②</sup>另一方面，通过对工农业总产值人均达到 800 美元的苏州市的实地考察，邓小平对“小康”水平具体是个什么样子，也同样基本做到心中有数了。

上述治国大思路大致形成并付诸实施以后，邓小平高度关注的就是它的实施情况，有了干扰，他就出来排除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sup>③</sup>

当然，讲从理论路线是非到纲领，到规划措施，再到抓落实的治国思路，不能绝对化，只是一种大致的、抽象的逻辑分析而已。在实践中，上述各环节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而且每个环节也并不都是一次完成的。这些都仍然离不开邓小平特别擅长的那个辩证方法，要辩证地看。

## 2. 治世理想

除了政治理想，执政者往往还追求一种比较理想的现实的治世局面，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把国家导向政治理想的彼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 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 页。

<sup>③</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09 页。

岸。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素来讲究治国之道。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有汉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等治世局面，其中渗透了历朝历代中国君臣百姓对于现实政治的殷殷期盼。长期以来，“左”的思潮影响所及，人们很少讲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即使偶尔提到，也是用“让步政策”等片面的阶级分析方法加以批判、否定，很少讲其中有不少属于合理因素的治国之道。但对治世盛世的希冀与追求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想定势，仍不时从人们的思想愿望中流露出来。

新中国的执政者及已成为国家主人翁的平民百姓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治世局面呢？凡是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要问到他心目中的治世局面，则无不对那个时代抱有怀念之情。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呢？毛泽东有过一种“笔端带着感情”的描述，他说：我们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们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对于这一种治世理想，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人物，当时就表示了支持与认同。过了 20 多年，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重新出来工作不久，就重提这一治世理想，多次引述了毛泽东那段引人入胜的话，并推崇延安时期的党内生活，50 年代的国家政治生活，以至 60 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就是上述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且强调两点：其一，毛泽东“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是讲整个国家，整

个军队 整个人民 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sup>①</sup> 其二 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 实事求是 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么，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sup>②</sup>

后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其他重要场合，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及其他一些重要文件中，都一再重申了这一治世理想、治国目标，并使之逐步具有了既安定团结又生动活泼，既稳定又发展，既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时代内容。以改革促进发展，以发展巩固稳定，以稳定保证改革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力图要造成的政治局面和良性发展机制。改革、发展、稳定，既安定团结又生动活泼，这就是邓小平所追求的治世局面。邓小平多次指出：战后日本以及我国台湾、香港等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多的也就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将这种既安定团结又生动活泼，既政通人和又持续快速发展的局面维持一二十年、三十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中国就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有希望；中华民族所向往的富强之梦就会成真。

### 3. 治国目标

邓小平的治国目标 追求的是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现代化是基础。在现代化进程中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一个现代化强国，是邓小平治国目标的核心。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 41 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 43 页。

现代化是一种世界进程，正如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进程一样。现代化虽然首先是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发源的，但它本身又与曾经作为世界进程的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更不是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的“专利”。从更深层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说，现代化是由 17 世纪工业革命为开端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性历史大潮，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和大工业文明转轨的人类文明的巨大嬗变，是当代世界的发展主流。当今世界，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现代化发展潮流作出反应。激荡 150 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尝试以各种方式对世界现代化潮流作出不同反应的过程。

在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前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抗拒、被动式适应与缓慢变迁的种种痛苦历程，始终处于现代世界的“边缘地带”。一个一度走在世界前列的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竟然长期游离于世界现代化主潮流之外，以至时时承受着“球籍”问题的沉重忧患。新中国诞生后，把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仍然历经极其复杂的认识和斗争。总的来说，在现代化问题上，建国后有过三次大的曲折。

一次是在 1956 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毛泽东及时向全国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但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影响下，这次提出的现代化很快转化为全国性的“大跃进”，转化为一场违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一次是在 1964 年底，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但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次提出的现

代化设想在没有付诸实施前就流产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取代了现代化的目标。但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日本、亚洲“四小龙”发生了悄悄的革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中国又一次失去了时机，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拉大了。

第三次再提现代化是在 1975 年初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力图通过全面整顿，把中国引上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但是，邓小平在该年底便被停止了工作 翌年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引导中国重提现代化的目标，从指导思想上入手，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邓小平一再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 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sup>①</sup>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向，邓小平领导了新时期的新长征，提出了以现代化建设为主旨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并且把“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变成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政治共识、共同意志，上升为党章、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样，实现现代化就不仅是当今中国的中心任务，而且是跨世纪的伟大纲领。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深刻阐述中，还渗透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科学思想。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实现是一个过程，是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现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80—181 页。

代化实现之前，虽然我们也讲社会主义，但其实不够格，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只有在实现了现代化，达到了中等发达、比较发达的现代化水平以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真正搞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合格。因此，“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思想，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小康社会”、“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以及“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念，是邓小平的中国现代化构想的精神实质之所在，是邓小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目标构想和发展蓝图。

#### 4.“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祖国统一构想

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对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怀有巨大的历史责任感。

在邓小平一生的言行录中，人们将会注意下面这几点：

一点是，在写给十三届五中全会的请求辞职信中，他用来概括自己一生奋斗目标的一段话：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

另一点是，邓小平退休以后，在一般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却让身边的子女，先后几次向海内外发出一个信息，即邓小平身体很好，等到1997年香港主权收回以后，他要亲自到香港去看一看，走一走，去拜访这一方祖国热土和人民。邓小平表示：就是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

还有一点是，在1989年会见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回首往事，总结一生，指出：“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关于香港问题，则已经

“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sup>①</sup>真是英雄暮年时不我予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拳拳之心撼人心魄殷殷期盼唤人奋起。

上述几点突出地表明，祖国的和平统一，在邓小平心目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终生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自大陆解放后，新中国最高层的领导者，无不热切希望能够实现全国统一，并为此努力不懈。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 70 年代末恢复工作不久，即盱衡大局，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 80 年代的三大任务，其中一大任务就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

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力争 80 年代达到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这个目标，“即使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sup>②</sup>

翻一翻中国历史，中国这块地大物博的东方热土，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国家统一的主流大势，从而与西欧那块土地上诸国星罗的政治版图形成鲜明的对照，根源在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巨大凝聚力及其崇尚统一的政治文化的优秀传统。

孟子——“定于一”；

吕不韦——“一则治，两则乱”；

董仲舒——“《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康有为——“中国只可一统，万无分立之理，更无分为联邦之理也”；

孙中山——“统一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95 页。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04 页。

怎样达到祖国统一呢？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祖国统一构想，在主权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提下，大陆与台湾两种制度并存，谁也不吃掉谁。

1979年1月30日，邓小平在访美时对美国参众两院解释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政策，明确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sup>①</sup>

显然，“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出发的，但在实践中，时势变易，却使香港、澳门垂范台湾，先于台湾而步入了“一国两制”的轨道。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接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了他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明确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同时指出：“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sup>②</sup>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就始终坚持了邓小平所表明的基本立场，推动香港成为实行“一国两制”的一个范例，以造成台湾回归祖国的有利态势。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着重阐述了按照“一国两制”构想实现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强调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制度可以不同，但在

① 转引自郑晓国等主编：《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年版，第12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12-13页。

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前提下，台湾可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受比香港更宽的独立，即除了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

在此以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祖国统一构想进行过一系列深刻的阐述。概而言之，邓小平“一国两制”祖国统一构想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问题的实质是祖国统一，国家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归祖国后的台湾，收回主权后的香港及澳门，都可以享受高度的自治，但不是“完全自治”。制度可以不同，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问题没有讨论余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排除任何阻碍和干扰，坚定不移地达成祖国统一的目的。这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性和中华民族统一性的集中体现。

第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台湾、香港和澳门设立中央人民政府统辖下的特别行政区，保留原有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需到北京。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这体现了统一前提下的相对独立性和高度的自治权。

第三，“一国两制”主体是社会主义。大陆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国两制”的主体和基础。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坚持“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允许两种制度存在。这体现了民族利益至上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张力。

第四，“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既是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腾飞的宏伟战略。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先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而且都取